我的家庭关系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

——历史交代(一)

Ⅰ　我于 1915 年 7 月 1 日(阴历五月十九日)生于上海陆家浜顾家湾的一所院子里。父亲陈文纬（1873－1944），母亲顾庆莲(1885－　)。我是我父亲的第五个儿子,小名叫做双伍。我又是我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母亲的长子夭亡，同母姊陈佩珍因肺病死于 1934 年,我就成了我母亲的长子。

Ⅱ　听母亲说,我的祖父是苏州的染坊工人,外祖父是一家扇子铺的老板，这家扇子铺雇用的伙计最多时不过二三人。陈家(祖父家)家计困难,祖母到外祖父家领做扇子活,陈顾二家就是这样熟识起来的。

祖父早故。父亲弟兄姊妹四人,伯父陈蓉生,年青时到上海江湾一带收购棉花转贩,推算其时当在 1890 年前。大概因为经营"得法",祖母、父亲、姑母等都迁居上海。父亲开始在苏州学药材生意,后来跟伯父做棉花生意,这就到了上海。

外祖母生过许多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姊妹二人,晚年的一个男孩子,长到八岁就死了。母亲是父亲的小姨,父亲和母亲的姊姊结婚,当在 1900 年左右。据母亲说,那时候外祖父衰迈了,顾家的扇子铺买卖愈做愈不行了，外祖父把多年积蓄的八百元

交给父亲做棉花买卖,父亲拿这笔钱独立开了一家花行,营业失败亏折掉了。

父亲早年大概也有过一段自学过程,他没有上过什么学,学会了做买卖、做帐房,学会了中医,据说,辛亥革命前还因医术在湖北一个什么衙门里做幕僚。不过多数时间,恐怕是跟伯父做棉花生意。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姐夫跟小姨的恋爱。小时候父母亲吵架,父亲跟我们说过,什么母亲生病,父亲为她治病的事,也许这就是他们结合的开始。看来外祖父母知道以后,木已成舟,母亲就正式成了父亲的侧室,但订下了条件(一)为外祖父母养老;(二)顾家无后,母亲生下的男孩子一律姓顾。因此,外祖父死后,外祖母就移居陈家。我是我母亲的长子,我就姓了顾。我的弟弟们因为陈家亲戚的异议,不按原条件姓顾,一律姓了陈。

Ⅲ 伯父做买卖大概比父亲精明得多,也狠心得多。所以,父亲做买卖从没有赚出一份"家业",伯父经营的"陈蓉记花行"(开设在上海南市外马路南码头附近的一条街上)却赚了不少钱,我推测,到伯父1920年左右病死的时候,资本总在一万元以上。伯父无子,只有二个堂姊,大哥陈怀农过继给伯父。1920年左右伯父死后,这家花行的资本大约分出三分之二以上归伯母一家,剩下来的部分算是大哥的嗣产,留在花行里,由父亲经理。

母亲的姊姊(我的大母)死于1915年或1916年,大母所生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1920年我母亲有三个孩子,1923年、1926年又生了二个弟妹,一家弟兄姊妹十人。

1924年,父亲经理的这家花行因投机亏折关了门,那时大概还残留一些钱,父亲设一个小花号继续做买卖,一二年内,恐怕这些残留的钱也完了,花号也收歇了。我现在还记得,1923

年,父亲有‘包车’(自备人力车),1924年,‘包车’没有了,又搬了家,住得窄了;1926年,父亲经常整天不出门,要我们(我和二个哥哥)拿东西上当铺,然后要我们去买酒,喝了酒和母亲吵架。

Ⅳ　这是一个互相埋怨、纠纷无穷的家庭。我的哥哥们指责我母亲和父亲的婚姻,说我大母是因我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忧郁而死的,指责外祖母、母亲、母亲所生的孩子们‘吃穷了’这一家。我母亲指责我父亲,说大母故世时父亲要她‘披麻戴孝’,把她当小老婆看待(我相信,其中还有指责父亲诱惑她的意思)。外祖母理直气壮地说,她和姓顾的孩子不是白吃这一家的,父亲还用过外家八百元做资本哩。加上姑母、伯母和大哥的岳家对这一家成员的各种影响,这一家愈穷,纠纷和吵架也愈加无穷无尽。

Ⅴ　纠纷的顶点是1926—1927年。1924年花行倒闭以前,家景还好,家庭生活表面上还是平静的。

我于1920年在小姑母的私塾(小姑母在清心女中非正规地上过两年学)读一二年级,1922年转入留云小学(我家附近的佛寺‘海潮寺’办的正规私立完小)上三年级,1925年,在留云小学读到五年级时,越级考取中华职业学校的初中商科(两年制),那时正好十岁。1927年7月,未参加毕业考试,进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当练习生。

留云小学校长王志莘(后来是新华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解放后和我们合作得还不错,已死),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关系密切。正是我在留云小学上学的几年中,王志莘得到简昭南(南洋烟草公司老板)的帮助,到美国留学了二年,回来后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在留云小学上学的时候,我家弟兄三人(三哥陈怀德,长我三岁 四哥陈怀良,长我一岁 都是异母哥哥)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国文教员殷亚华(浙江嘉兴人,1941年肺病逝世于

上海),对我们弟兄三人很注意。1925年,我考上中华职业学校时,三哥陈怀德小学毕业,考上了育才中学,四哥陈怀良,还在那里上学。我们离校后,也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师。1926年秋,新学年开始,家里拿不出学费了,我们弟兄三人同时辍学,殷亚华知道后,为我向王志莘提议,请中华职业学校给我学杂费减半(减半,连书费,一个学期还要20元以上)的优待,学校同意后,外祖母和母亲拼凑"私蓄",再度上学,已在10月中旬,距开学已六个星期,这样勉强又上了一年。大概通过此事,王志莘也知道了我这个孩子。潘序伦和王志莘是留美同学,1927年夏,潘要王给他介绍一个练习生,就把我介绍给他。我到潘的事务所的时候,正好十二岁。

Ⅵ 1926年一度辍学和1927年就业的时候,家庭纠纷达到了顶点。花行残留的钱,到1926年彻底地完了。大哥那时在一家钟表眼镜行当帐房,二哥在黄炎培等人办的"甲子社",一个文史资料机构(后来发行《人文月刊》的)工作,1927年后,在国民党的上海市公用局工作(二哥1925年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高中工科)。1927年,父亲先在别人开的花行里当了一年帐房,后来由棉花同业的帮助,在一家慈善机关"联义善会"当管事人,兼当中医,每月工资30元,也许还有一些出诊的诊费收入。我母亲所生子女五人,连同母亲、外祖母共七人,加上异母姊兄三人,父亲无力全部赡养,势必要大哥二哥分担一部分家用。可是我母亲这个"系统"的七人,要大哥二哥分担家用,似乎是决不可能的。到1927年底,这一家到底取得了"分家"的协议(一)大哥、大嫂、二哥、大姊、三哥、四哥住在一起,由大哥二哥负担家用;(二)外祖母、母亲、我们同母弟兄姊妹五人住在一起,父亲每月津贴15元,其余由我的工资、外祖母、母亲和二姊的女工活来维持。父亲住在善会里独立生活。

这时候,我除所里供膳食,每月工资 12 元，连同父亲津贴,每月 27 元,除房租 8 元，当然不够一家衣食开支和一个学龄的弟弟的教育费。所以,外祖母和母亲揽洗衣服,揽缝纫活,二姊则学会了“外国刺绣”(即绸质女内衣上的素色凸形刺绣),共同维持这一家的生活。1928年以后，我每月的工资和实际收入逐渐有所增加,到 1930 年，大约每月实际收入超过 30 元。1930 年,二哥失业,父亲经常资助他,原来父亲给我们这一“家”的津贴，我们不要了。这一家的生活，就主要由我的工资来维持了。

Ⅵ 大哥二哥这一“家”,不久就“解散”了。三哥失学后,曾在一家花行当学徒。1928 年,我已在潘序伦那里当练习生,又去投考持志大学招收讲义生被录取,因为工资比潘那里低,推荐三哥去,学校同意了,每月工资 12 元,膳食自理,不久,他成了该校“国学系”的工读生,此后就以我家为基地了。四哥跟父亲学中医,住在“联义善会”里,也成为我“家”的成员。大姊到镇江一所蚕桑学校学习,大哥和二哥也分开不住在一起了。

Ⅶ 附带交代一下全部亲戚关系：

外祖母移居陈家后,顾家在苏州的亲戚简直断绝了往来,只记得外祖母生前，她的一位堂弟到上海探望过几次。父亲弟兄姊妹四人。伯父陈蓉生死后，伯母住在苏州，和我家绝少来往。伯父有二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在上海莘庄附近的地主梅家，1934 年前见过一二次，1934 年后就毫无来往。另一个和上海一个资本家家庭中的大学毕业生赵林诚结婚，1930 年左右他们结婚婚礼上大哥闹了一场，以后简直没有来往。1949 年我回上海后，这位堂姊来过我家一次,我未回访,以后也无往来。

大姑父姓徐,是电报局的职员,算是很早办洋务的。大姑母死于 1920年左右,大姑母无子女,大姑父续娶后很少来往,大姑父大约死于 1924 年左右。小姑母嫁给大姑父的弟弟，小姑父没

有固定职业，干的是‘地保’一类的事，1940年我离开上海前，一直来往。小姑母只有一个女儿，表妹夫是医生张秀彬，现在苏州医学院，1949年回上海后和他们还来往，1953年我来北京后无来往，1962年我出差上海时去苏州他们家探望过小姑母。

大哥陈怀农（1902—1945），一直是职员。1927年在一家钟表眼镜公司当帐房，其中几经变迁（曾多次失业），抗战期间在重庆新民机器厂（老板胡厥文）工作，抗战胜利时，死在重庆。大嫂杨履洁，上海解放后在上海一家消防器材厂工作，1960年左右退休，住在她女儿家。侄女陈日修，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四师地区工作，抗战胜利后转去东北工作，现当教师（1965）。侄女婿李东林，1964年时是天津化工学校的负责人之一。

二哥陈怀圃（1905—1950），20年代在‘甲子社’和上海市公用局工作过，后来是上海化学工业社的职员。解放后通过招聘去东北统计局工作，1950年死于出差北京旅次。二嫂陆景芳，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侄儿陈昌煦，上海一家造纸厂的技术工作人员。

三哥陈怀德（1912—1958?），1937年前是上海地下党的党员。抗战暴发后去临汾民大，转陕南褒城当教师，后来当了胡宗南的官（弄不清是区长还是县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判处徒刑20年，1958年以后不知消息，据离了婚的三嫂函告大姊，肯定是死了。

四哥陈怀良（1914—1938），1934年参加地下工作，抗战暴发后去武汉转临汾民大，在日寇轰炸中牺牲。

六弟陈敏之，在上海城市建设委员会任秘书长（1965）。

七弟陈吉士，山东德州专区副专员（1965）。

大姊陈秉真，退休的蚕桑工作者，大姊夫宋学勤，上海城市建设局工程师（1965）。

三妹陈枫，山西大学党委宣传部长(1965)。妹夫施义之，某军政治委员(1965)。

Ⅸ 综上所述，可知我幼年时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之中。这个家庭的上一辈是城市手工业者，父亲这一代，乘上海买办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机会，爬上了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父亲本人没有爬得上去（还记得母亲说过，30—40年代上海一家规模很不小的达丰染织厂的老板崔福璋，是父亲做棉花生意时比较接近的同业），但依靠伯父的遗业，使得我的幼年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八九岁（1923—1924）的时候，这个家庭破产了，又因为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的纠纷，使我在家庭中处于卑微的地位，这是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因素。然而这种家庭环境，截然不同于深受压迫的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庭环境，这决定了我内心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至于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另作专门交代。

说到1965年前我还有联系的亲戚，那么所有的亲戚都是机关、学校、部队的工作人员，而且大部分做领导工作，也有工程师和医师，绝少普通工作人员，按其性质，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彻底性全比我高得多，但对我本人来说，“全都是知识分子”这一客观事实在我思想上确实助长了轻视体力劳动，助长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的作用。

认识以上两点，我相信对于挖掘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阶级根源是有好处的。

顾 准

1968/Ⅺ/30

1927 — 1934年的社会职业生活

——历史交代(二)

Ⅰ　1927年7月中旬，我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1929年，因为所里有人领到会计师执照,会计师不止潘序伦一个人了,故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正好十二岁。这时候,潘的事务所有专职职员二人(唐荣山、俞晋贤),兼职职员二人(丁震、顾询),“茶房”一人(徐秀林),我去,算是第六个人。第一个半月,除供膳外,潘给我工资4元,第二个月6元，以后逐月增加2元,到11月份工资12元,就停住了。每月12元的工资，拿了一年半左右,以后才续有增加。

初进所时,因为人少,除当练习生应做的给客人倒茶、到银行送款等杂差外,有些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也让我办。以后加入很快，这些业务有人专责办了，我就做一些抄写、跑腿等辅助工作。我还学会了中文打字、英文打字。又进所后一个多月,因为工作不认真,潘告诉王志莘,我去工商银行送款时,王志莘(那时他在该行当襄理、营业主任之类的职务,已经不在中华职业学校了)特别警告我,工作不要马虎。到1928年上半年为止，我在这个事务所里的工作，潘大概还是不很满意的。

Ⅱ　1928年春，潘利用他事务所的房间，在晚间开办了会

计夜校。夜校每学期为一“届”,第一届我没有进夜校上学,第二届(1928 年秋)我进夜校念了半年簿记,算是懂得一点簿记了。此后,当过本所的会计员,当过查帐助理员,但主要是在文书科(代办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业务)工作。

会计夜校办得很发达,学生愈来愈多。潘办会计夜校特别着重作业,课卷多,设助教帮教员改课卷,当助教的人每月给 6 元津贴。大约 1929 年秋季起我当上了助教。又潘因为当时的中文簿记教本不合适,1929 年起找了他在暨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吴君实等人来编写《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我夜间抄刻钢版讲义,每张约 1500 字,可得一角二分五,每天晚上可写二张左右,这样收入就多了一些。

Ⅲ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编写后期,大约是 1929 — 1930 年之交,我成了专任编辑助理的工作人员了。这本教科书每章后附练习题,全书最终设一个附有单据帐本、专成一套、单独发售的实习题,为供教师改课卷参考,所有习题编成“习题详解”;此外如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跑印刷所、校对等等,这些工作潘都要我做。教科书连同各种附件都出版之后,潘又利用这本教科书办了函授学校。因为函授学校教师学生不见面,我那时虽然太小(1930,15 岁),但却让我负责这个工作。我的工资增加到每月 20 多元。又潘为笼络所内人心起见,约自 1930 年起建立了半年“分红”一次的制度,分到的“红利”开始约为工资的一半,后来达到工资的全额。到 1932 年初,我每月的实际收入在 60 元以上了。

Ⅳ 1930 年上半年,立信的会计夜校已办了四届,毕业生李建模、马尧圻等发起组织“立信同学会”,每年每人会费 1 元,办一些编印同学录、会员通讯、参观、聚餐等活动。同学会开始办起来时我未参加活动。1931 年,同学会改选时,我参加了“竞

选”,被举为同学会负责人之一。改选以后的同学会出版‘学术刊物”《会计季刊》(后来潘序伦接过去办了《立信会计季刊》),组织参观大工厂,编印会刊,组织聚餐。李建模就是在同学会的活动中熟识的。

Ⅴ 1931 年下半年,我十六岁。会计夜校学生增加得多,班次多开了几班,潘序伦要我担任人数较少一班的教师。因为年龄实在太小,上班不到一星期,学生反对我这个小孩子当教师,换了别人去。1932年下半年,潘又要我担任一班的教师,这一回站住了,没有再被轰下来。

就在这一学期,教银行会计的教师钱迺澄因故不能担任教课,潘要我兼代,也教下来了。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本,开始自编讲义,于 1933 年经二个学期的试教和修改,于 1934 年列为立信会计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印行,1934 年 9 月初出版。这本书的版税一律收入立信事务所的公帐(这个“公帐”,潘序伦一个人要分去一半以上),他只额外给了我八百元稿费,算是我业余时间写作的报酬。

又 1932 年秋,立信‘学校部主任’李鸿寿(1964 年时还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副院长)离所,潘要我接替他的工作,到 1934 年 8 月我‘第一次流亡’时为止。

Ⅵ 到1934 年,家庭里也有不少变化。外祖母死于 1934 年上半年,同年,二姊陈佩珍因肺病亡故。按照当时习俗,二次丧事耗费的数百元是预支《银行会计》稿费应付的。三个弟妹均达学龄,都已上学,其中陈敏之上了中学。三哥陈怀德在持志大学国学系工读,好像是 1934 年秋毕业的。毕业后离开学校,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 1934 年时我每月收入在 100 元以上,家庭经济宽裕得多了。

就在 1934 年 2 月,我和同事学生等共八个人组织了进社。

1934年5月，进社接受了远东反帝同盟的领导。1934年8月，领导进社的远东反帝同盟的刘丹被捕，我离开了立信，并和进社社员李燮泉一起在租界上住亭子间（以后就单独一个人住），离开了南市的老家。从此以后，到1940年7月离开上海为止的社会职业生活，又是另一种情形，见历史交代(五)及(六)。

Ⅶ 潘序伦是1924年左右回国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在当时的"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后来的上海商学院)和国立暨南大学任教，1927年初才办了他那事务所。他后来以办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编印立信会计丛书闻名，这两项"事业"，都开始于1928—1930年的开办会计夜校和出版《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这两件事情上，其实他的发迹，还另有一段历史。1927年北伐军克服上海时，上海闸北一带曾经过激战，事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当地房产业主免除房客的房租两月。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筹措军费，曾向上海房产业主征收了两个月房租的特捐。1927年秋，以五卅运动时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沈莲芳（此人在五卅运动时政治态度十分反动，取媚英帝，反对罢工，也反对反帝的"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为首的闸北房产联合会，向国民党政府力争"捐而不免，免而不捐"，要求退回免了租的地区内国民党政府征收的二个月房租的特捐，受托办理此事的代理人就是潘序伦。那次所争的目的达到了，潘一下子分到了好几万元的报酬。在此以后，潘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二项主要业务——查帐和代办公司登记、商标注册。后者，使他和1927年后上海一时兴起的一些民族工业(染织、橡胶、纸烟、灯泡、电木、家用化学等等）资本家取得了一些联系。至于查帐，则凡遇有争议的案件，他一无例外站在资本家这一方面。我现在还记得，1928年或1929年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领导罢工的是黄色工会)，劳资两方对于公司利润大小有争议，委托潘序伦查帐鉴定，公司方

面派人向潘示意送礼，潘的查帐报告书当然偏袒了资方。当时我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强烈地同情工人，厌恶资本家〔参见历史交代(三)〕，对于潘的这类甘做资本家走狗的行径很不满意，常在同事中说些‘过激’的言论。

1930年，潘为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又在‘国民政府’新成立的主计处（主计长陈其采，是蒋介石老上级陈其美的弟兄，陈果夫、陈立夫的叔父）谋得了会计局副局长的官职，到南京做了大约半年的官，他这次做官是为了镀金。在南京常回上海，半年后辞职，又回到上海来‘办’他的立信事业了。

Ⅷ 这时期立信的同事，记得起来的有下列诸人：

安绍芸 留美学生，1928年和潘‘合作’过几个月，不久就走了。以后在大美查帐局——一家美国人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但主要是在上海各大学教书。1949年上海解放时，东北招聘团（雍文涛、林里夫)到上海，由我介绍和招聘团见面，组织了一批会计人员去东北。东北不要，转到北京，中财委决定他们到中央财政部，这批人成了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主要班底，安任第一任司长。

顾询 上海商科大学毕业，1952年五反运动中，自悔抗战胜利时干没过‘新闻报馆’一批纸张(据说没有斗他，大概也未列为五反对象）自杀。

丁震 上海商科大学毕业，1928年离所自己做生意。文化大革命前见上海报纸的统战消息中有他的名字。

钱迺澄 上海商科大学毕业，解放前成了一家铅笔厂的大股东。

唐荣山 1936—1937年间转到金城银行所属的纺织公司（诚孚公司）当会计。现在下落，陈文麟可能知道。

俞晋贤　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毕业，1930 年左右自己开袜厂去了。

夏星寿　民立中学毕业，1927 年底病死。

章钦贤　民立中学毕业，1933 年前后病死。

李鸿寿　复旦大学毕业，现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

吴君实　暨南大学毕业，1930 年离所到京沪铁路局当会计。

王澹如　上海商学院毕业，现在广东暨南大学会计教研室。

陈文麟　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现任上海南市区副区长。

施仁夫　上海商学院毕业，1949年上海解放后，进上海税务局任副处长。

唐文瑞　上海商学院毕业，1949 年知道在上海某纺织厂工作。

蒋春牧　公私合营时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经理。

徐子康　1949 年进上海税务局，1952 年在某区分局工作。

潘秀章　1964 年在广东中山大学会计教研室。

许鸿宾　重庆钢铁公司会计，曾参加过武装自卫会。

李燮泉　进社社员，1952 年在上海粮食干校任教。

我在搞函授学校和当学校部主任时的助手，有：

金国琛　1949年进上海市财政局工作。

沈尉萍　进社社员，1956 年在城市服务部工作。

甘允寿　长时期一直在立信，1956 年全国公私合营中统一安排工作。现在下落，陈文麟可以知道。

Ⅸ　这一时期的立信同事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庄文恭。他是最早的留苏学生之一，五卅运动和1925 — 1927年大革命时期曾任党的江苏省委书记(？)，大概四一二事变后，当了逃兵，躲起来了。1928 年春，潘序伦开办会计夜校，他改换姓名叫做韩

曼涛，进夜校第一届读会计，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潘即吸收他进所工作。在几次疑难的查帐案件（大德新油厂、贾汪煤矿等）中，他主办查帐案件，办得很出色。他兼夜校教师，讲解详明，极受学生欢迎。他头脑敏锐而沉默寡言，但绝不谈政治，也绝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偶然（极其偶然，大概所里只有我一个人发现过）也漏出一句二句哲学气味浓厚的语言。1929—1934年这几年中，他是立信事务所查帐和教书两方面的台柱子。1934年前后，他自己“钻营”进中央信托局当主要会计职员去了。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期内，他的有经验的眼光，应该看到我这个孩子怎样成长，思想怎样变化，可是，他对于我的思想转变，却从来没有起过一点作用——既没有积极的作用，也没有消极的作用，真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1934年我参加地下工作以后，曾向他临时通融过钱，因为我猜测他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曾给他看过毛主席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看过还我，也不置一言。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他那时在中央信托局被“接收”，我通过该局军管人员顾濂溪（1935年春在上海中学教书时的学生，解放时是地下党员，1964年知在上海财政局）把他要出来到上海直接税局工作。人事部门要他填表，大概经过三番四复的考虑，他把1927年前的历史告诉了我。我转报华东财委曾山同志，曾山同志把他调到华东财政部。1953—1954年他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作时曾见过他一次，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了。

顾　准

1968/Ⅻ/15

我的思想转变过程

——历史交代(三)

Ⅰ 1927 年北伐军克服上海以前，小学和中学里的教育，是五色国旗，国歌“庆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国文教材上的黄梨洲《原君》、《原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林觉民的遗书等等，总之是辛亥革命所确立的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五四运动的曙光还没有透进中小学的课堂，小学里国文教师殷亚华（他后来是同情掩护我们的地下活动的）还以《非非孝》(即‘非’难五四运动中反对孔老二的孝道即‘非孝’的主张）为题要我们写作文。五卅运动中我们曾经拿着竹筒，打着旗帜，为罢工工人捐过款，但是五卅的枪声我们没有听到（我家住在南市的南面），五卅以后的大罢工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到租界上去,家里还点煤油灯),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竟没有在我这个小孩子的脑袋中留下过什么印象。

1927 年北伐军克复上海，知道的事情就多得多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前，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爪牙李宝璋大肆逮捕党人，把捕到的党人砍下头来放在木笼里挂在大街上示众，我看见过；3 月下旬，第三次武装暴动中的工人纠察队进占我家附近一个警察所，我亲眼看到挂红布标帜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门口，夺下门

岗手中的枪,取下警察头上戴的帽子扔在地上,直入警察所内部缴枪,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北伐军克复上海以后,四一二以前,我和三哥二人在董家渡江滨(大概是警戒黄浦江里外国军舰的)的沙包工事中看架在那里的重机关枪,和驻守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谈话,听他们说部队里也有小孩子,是勤务兵时,曾要求他们收留我们当勤务兵。学校里(中华职业学校)一夜之间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国旗,挂上了孙中山像,开始做周会,背诵总理遗嘱,原是国民党地下党员的国文教员邱铭九(1929年左右在当宝山县长,以后就听不到这个人了)公开他的身分做演讲,校长潘仰尧(王志莘已离校到工商银行)一反平时态度,热烈歌颂起国民党和北伐军来了。北伐军东路军(何应钦、白崇禧所部)的总政治部设在后来成为上海中学的小西门内的龙门师范里,我们居然也可以随便进去。同班同学甘绩瑞,因邱铭九的介绍,参加了总政治部的宣传队,队部在斜桥的一个会馆里,曾去看过他,见他穿上背斜皮带的军服,十分羡慕。但是对于当时的政治事变,如最初成立的以宋庆龄为首的上海市政府,四一二屠杀,强迫解散总工会,张定璠任市长等等,有的根本不知道,有的听到了也不了解其意义,也没有对我的思想发展投下过什么波澜。四一二以后,总政治部大量裁减人员,我的同学甘绩瑞也出来了,一切恢复旧观,又安心上学了,只多了周会和总理遗嘱而已。

Ⅱ 1927年7月进潘序伦的事务所,那时家庭纠纷达到顶点,下班后不想马上回家,就逗留在所里。进所不久,夏星寿进所了,很快和他成了知己朋友,下班后总到他家逗留到深夜。他家也是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本人是地下时期的国民党员,对当时的政治不满意,已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业余翻译童话,给《小朋友》投稿,我在他家学英文,还从夏的民立同学

那里学过几天法文。不到半年，我的这个好朋友病故了。他的哥哥夏增寿，后来是我的政治上的启蒙者，进社的最早社员之一。

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甘绩瑞（后来知道，他是四川军阀刘湘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甘绩镛的亲戚），1927 年秋季进了劳动大学。他比我长六七岁，在校时并不接近，记不起因为什么原因去劳大看望过他一次，以后每周六下午五点以后就长途远足（校址在江湾，后来迁到蕴藻浜泗塘桥）到劳大，周六在那里住宿，星期天在那里玩一天，星期天傍晚或星期一凌晨远足回来。劳大前身是上海大学，那时的校长是易培基，学校里有共产党，但无政府主义思潮流行，甘绩瑞那时也信从无政府主义。我从甘那里借读了李芾甘（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书以后，热烈地信从无政府主义起来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对于这些书中对"集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性的称谓）的攻击是不理解的，我们热烈吸收的是那里对资本剥削劳动的激情的控诉。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有过对革命生活的憧憬，对于当时的职业生活，认为是在给资本家的走狗当奴才。但是究竟怎样革命，革命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却又十分朦胧。

与此同时，1928 年宜兴暴发了我党万一同志领导的暴动。潘的事务所里那时已有好几个宜兴人（潘是宜兴蜀山的地主），暴动以后他们在谈论此事，我热烈地赞成暴动，还对同事们说，我也要扛起红旗来。

Ⅲ　家庭负担的生活现实，压下了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1927—1929 年的革命憧憬是不结果实的。甘绩瑞在 1929 年离劳大到福建泉州当中学教师去了（大约 1931 年又离闽经沪返川，依托亲戚关系去占领四川教育界的一席地盘去了。1933 年后我就和他不通音问）。周末远足生活只好停止下来，无政府主